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季羨林文集

第一卷

散文（一）

第一卷

散文（一）

季羨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辑:胡乃羽
本卷责任编辑:杨鑫福
本卷责任校对:罗小丽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羡林文集

Jǐ Xiānlín Wénjī

第一卷:散文(一)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75 插页:9 字数:400,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1927-0/Z·1

定价:52.00元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熊向东 李 铮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 铮 张光璘 季羨林 胡乃羽
段 晴 郭良鋈 秦光杰 钱文忠
黄宝生 蒋忠新 熊向东

策 划

杨鑫福 吴明华

责任编辑

吴明华

美术编辑

刘良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季羡林



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大官庄——作者的故乡。



大官庄外的土路，作者幼年时常随母亲经此去地里劳作。

历史研究新想

李桂林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五十年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写过一些研究和探讨。但是，到了今天，年届花甲，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都只能是暂时的假说，与真正的结论相去以远。

大家都会承认，今天我们对古代史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前人。换言之，离开古代越远，则对古代史的了解就越深刻、越细致，时代差距与了解古代史的一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归纳起来，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研究的指导思想随时存在变，越变越唯心，越精细，从而也就越能实事求是。大体言之，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与利用历史唯心主义，其结果大不相同，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是泛指而言的，决不能作教条主义的、肤浅的、僵化的理解。最近四五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由于教条主义僵化，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第二，研究的手段也随之存在变。我有一个

李桂林稿纸 (20×25=500)

第一页

作者手迹。

济南市三和街小学，
作者曾在此就读。



K2738/12 08

· 1 ·

出版说明

《季羨林文集》是 1992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羨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自 1933 年至 1985 年的散文创作。绝大部分作品已收入《季羨林散文集》(1986 年 12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共包括四个小集,即《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和《燕南集》。本卷即以《季羨林散文集》为基础,又补收了若干篇,如《忆日内瓦》、《同声相求》等。

三十年代,作者曾应约准备编一本散文集,后因故未果。1985 年编选《季羨林散文集》时,特意将解放前的作品集成一集,并以过去想好的名字定名为《因梦集》。

《天竺心影》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1980 年 9 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作者三次访问印度后所写的见闻。

《朗润集》1981 年 3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解放后所写的部分散文。

《燕南集》收《朗润集》出版后至 1985 年写的散文。有几篇是《朗润集》出版前写的,因为没有入过集,也补收在《燕南集》里。

另外,最近搜集到的作者中学时代(1929 年)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的三篇短篇小说,作者把它看作是习作,因此附录在卷末。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2 年 3 月

自序

确确实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出起《文集》来。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編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一篇长恨有风情
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
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
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
新排十五卷诗成

像白乐天那样伟大的诗人,只不过编好了一部有十五卷的诗集,竟然高兴到“气粗言语大”的程度。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陡然编成了一部有二十几巨册、长达八百万字的《文集》,难道还需要隐蔽自己那无比的欢喜吗?

我舞笔弄墨六十余年,至今年届耄耋而积习未改,看来我同学术研究似有天生的缘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常说,我少无大

志。这决非自谦之词。十几岁的时候,我连报考济南赫赫有名的一中的勇气都没有,心甘情愿地走进一所带“破”字诨名的私立中学。进了学校,也不知道用功,整天钓蛤蟆、捞虾。一直到了高中,瞎猫碰到了死老鼠,我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了九十五分,成为全校之冠,受到了前清状元、山东大学校长兼教育厅长的表扬。在名的诱惑下,我才开始用功。但是对于研究学问,仍然连想都没有想过,认为这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干。甚至考上清华大学以后,也没有改变我这种态度,梦想毕业以后,当上一名中学教员,养老抚幼,就可以了此一生,心满意足了。细算起来,仅仅由于一个偶然又偶然的会,我到了德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到现在也已有五十多年了。

有经验的过来人都会知道,做学问这一条道路走起来是并不那么容易,路上有玫瑰花,也有荆棘;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时候要忍饥受寒,因为忘记了穿衣吃饭;有时候会连夜失眠,因为脑袋里考虑的问题太多,神经经受不住压力;有时候会给别人的自行车撞倒,因为自己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目中无人;有时候会被人嘲为痴呆,因为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有时候还要冒点生命的危险,因为怕浪费时间,病了不去医院;有时候会受到商店售货员的白眼和训斥,因为不修边幅,说话罗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最近几十年来,还要抗得住“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不怕“修正主义”这一根大棒,以及“白专道路”和“名利思想”的嘲讽。走在这样一条做学问的路上,简直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个中甘苦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人一旦走上了这一条路就很难回转。我个人由于一点偶然性,踏上了这一条道路,走来走去,好像真成了必然性。我现在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更何况自己已是桑榆晚景,没有后退的可能,也没有后退的必要。在这一条路上,

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已经走到了出《文集》的地步了。

大家都会明白,出《文集》这一扇门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敞开着。既然这一扇门对我敞开了,我本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自己在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上,在这样漫长时间内亲身感受到的一些经验与教训,这样做对己对人都会有些用处的。但是,我继而一想,莫若再等上四五年,等全部《文集》都已出完,读者对我的著作都已有了程度深浅不同的了解,到那时候再来做这一件事,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来一点“厚黑学”,做一点自我宣传:读者朋友们!读一读我的《文集》吧,文章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妙笔生花,誉满全球。等到书出完了,我还会有精彩的惊人的表演。你们决不会失望的。

我这些话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读者自能明辨,用不着我多费笔墨,耳提面命。无论怎样,即使几年以后,《文集》出全了,我也决不会就此打住,相信我也不会寿终正寝。我还是要在这一条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我觉得,学术研究是一场接力赛,一代传一代,代代有所增益;但是,这一场接力赛是永无止境的,谁也别想跑最后一棒,一个猛冲,就能抓到绝对真理。

这话说远了。我还是回头来讲点当前心里面非说不行的话吧。现在中国出版界的情况,大家都心中有数。出版家面临的困难,更是有目共睹。在这样的困难中,江西教育出版社还有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同志,竟垂青到我身上来,实出我意料。我自谓颇有点自知之明。我不说,我的文章全是垃圾,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不是谦虚,而是虚伪。我也不说,我的文章全是精华,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是自我吹嘘。实际情况恐怕是垃圾与金银并举,精华与糟粕共存。我跑的这一棒在接力赛中也起了一点作用。话至多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选张三可以,选李四也未始不可。结果却选到了我头上,仅仅说一声“感谢!”能完

全表达出我的心情吗？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熊向东同志、秦光杰同志、杨鑫福同志和吴明华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个《文集》是决定出不来的。熊向东同志热心的精神和坦荡的胸怀，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预示我们的合作一定能顺利进行。

集中的作品大多发表或出版过。有的多次重印。但因为语种多，古怪东西也不少，我们国家的校对制度还不够健全，所以鲁鱼亥豕在所难免。现在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决心改正这个缺点，为了全国和国外读者的利益，我们不能再辞辛苦。我们特别成立了一个编委会，集合有关方面的专家，对所有收入本《文集》的作品，一律从严仔细审阅，尽可能地消灭一切错误。对文中引文一律加以核对。有一些作品是在国外写的，引用的书中国全国任何图书馆中都查不到。只有这种情况才迫使我们网开一面。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个困难的头我们已经开了。我个人虽已老迈，但尚未龙钟。我决心追随诸年轻的君子之后，尽上我的绵薄，把事情办好。四五年以后，我们大家来共同庆祝胜利。

1992年2月15日

自 传

季羨林,生于1911年8月,原籍是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家庭是农民。父亲和叔父幼丧父母,家里贫无立锥之地,被迫逃到济南谋生。经过艰苦奋斗,叔父终于在济南立住了脚。我于七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在那里上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外国语文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回济南任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学习着写一些东西,也曾翻译过一些欧美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选了几门外系的课,其中之一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

来不信任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研究印度的兴趣,我学习梵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国许多梵文学者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从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的,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以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召参军,他的前任西克(Emil 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又出来担任教学工作。这位老人待人亲切和蔼,对于我这个异域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今天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他教导的结果。我毕生难忘我的德国老师们。

在德国十年,我主要致力于语言的研究,对于印度古典文学很少涉猎。

但是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在科学研究方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现在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结果我就成了一个“杂家”。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这就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对于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兴趣。在德国求学时期,遇到有关资料,我随手札记。回国以后,既然研究印度古代

语言和吐火罗文有了困难,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资料,写过一些文章。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集成了一个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初,我把这个集子进行了改编,把有关印度古代语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汉文写成的论文,编成了一册,名之曰《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文章和五十年代以后新写的与此有关的文章编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至于翻译,五十年代初,我翻译了一些近代德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等等。翻译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已经集成了一个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7年起,我陆续翻译、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十王小传》(选译)等等。从1973年起,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南亚东南亚各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印度各种语言和国外许多语言的译本。它对中国也有影响。蒙、藏和新疆地区,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罗摩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也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却一直没有汉文译本。在过去,翻译这样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对于我这个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忙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所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头上被戴上的那一堆可怕的帽子,一顶也没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学生宿舍和系办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楼里,去看守大门,传呼电话,分发信件。后来不知怎样一来,我又成了教师,教一点英文。总之,我是靠边站,除了上面说的那些杂事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我从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巨著译完。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